

《黄帝内经》怒志理论发展概要

张 岚¹ 邹纯朴^{2*}

(1. 上海医药高等专科学校中医教研组, 上海市南汇区周祝公路 279 号, 201318;

2. 上海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内经教研室)

* 通讯作者: chunpuzou@126.com, (021)51322118

[摘要] 梳理了怒志理论的发展概况。《黄帝内经》的相关论述标志着怒志理论的初步形成, 随着晋至隋唐时期的发展, 宋金元时期医家的融会贯通, 以及明清时期医家的整理与阐发, 怒志理论日趋成熟与完善。“怒伤肝”、“怒则气上”是怒志致病机制的简要概括, 从肝论治是治疗的主要法则。

[关键词] 黄帝内经; 怒; 情志致病

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 心身疾病、心理障碍及社会适应不良等问题已成为危害现代人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而在中医学学术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情志学说, 自《黄帝内经》问世以来, 经历代医家不断发展, 在病因病机、病证、诊断和治疗方面都更加充实和完善。宋代理学家程颢曾指出: “夫人之情易发而难制者, 惟怒为甚。”怒作为五志之首, 与他志相较, 因其易发、难制的特点而更易致病, 在七情致病因素中, 具有突出地位。本文试图梳理出自《黄帝内经》以来历代关于怒志理论的发展脉络, 力图进一步丰富完善中医情志理论, 以期为临床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

1 秦汉三国时期: 怒志理论的初步形成阶段 作为中医理论体系的奠基之作——《黄帝内经》

中包含着极其丰富的情志学说内容。《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 “人有五脏化五气, 以生喜、怒、悲、忧、恐。”认为五志的物质基础为五脏的精气, 从而首次建立了五脏五志说。对于怒志理论, 《黄帝内经》则展开了较为深入、精辟的论述。据统计, 在书中涉及“怒”者达 47 篇, 共计 93 个词条。其中以喜怒为表述的词条出现了 25 次之多。

《黄帝内经》全面分析了怒志为病的病位、致病机理。《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指出: “怒伤肝, 喜伤心……”, 强调情志过极可伤及相应的脏腑, 大怒最易伤肝。“喜怒伤气, 寒暑伤形; 暴怒伤阴, 暴喜伤阳”。明确指出五志由内发, 故先伤五脏之气; 暴怒可致肝气逆而血乱, 血属阴, 故伤阴。《素问·举痛论》曰: “百病生于气也, 怒则气上, 喜则气缓……”,

[6] 刘垲, 谢雁鸣. 中成药上市后临床文献评价的流程与要点[J]. 中国中药杂志, 2011, 36(20): 2848-2850.

[7] 陈钢, 武曦, 杨丽萍, 等. 基于专家问卷调查及德尔菲法的糖尿病肾病中医证候研究[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1, 26(10): 2241-2244.

[8] 袁世宏, 王天芳, 张连文. 中医证候的认知思路及其数据挖掘方法[J]. 中医杂志, 2011, 52(4): 284-288.

[9] 白云静, 申洪波, 孟庆刚, 等. 中医证候研究的人工神经网络方法探析[J]. 中医药学刊, 2004, 22(12): 2221-2223.

[10] 李磊, 黄水平. 支持向量机原理及其在医学分类中的应用[J]. 中国卫生统计, 2009, 26(1): 22-25.

[11] 王阶, 吴荣, 周雪忠. 基于支持向量机的名老中医治疗冠心病证候要素研究[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8, 31(8): 540-543.

[12] 龙伟, 刘培勋, 曾平, 等. 支持向量机与中药研究[J]. 中草药, 2008, 39(10): 1441-1445.

[13] 陈建设, 陈文培. 胃脘痛证候量化诊断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J]. 中医研究, 2009, 22(9): 26-28.

[14] 刘国萍, 邓峰, 夏春明, 等. 基于隐结构的中医脾系问诊信息客观化分析[J]. 中医杂志, 2011, 52(16): 1372-1375.

[15] 谢世平, 陈建设, 许前磊, 等. HIV/AIDS 证候分型及量化诊断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10, 16(7): 577-579.

[16] 洪燕珠, 周昌乐, 张志枫, 等. 基于随机森林法的慢性疲劳证候要素特征症状的选择[J]. 中医杂志, 2010, 51(7): 634-638.

[17] 申春梯, 陈后光, 陆岩, 等. 中医证候要素研究中潜在变量模型的应用[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0, 33(11): 725-731.

[18] 罗天娥. 非正态及非线性重复测量资料分析模型及其医学应用[D]. 太原: 山西医科大学, 2007.

[19] 王丽颖. 冠心病心绞痛血瘀证的药效学解构与动态演变的多维度诠释[D]. 北京: 中国中医科学院, 2008.

(收稿日期: 2013-01-17; 修回日期: 2013-03-06)

[编辑: 黄 健]

说明七情对五脏的影响主要是导致全身气机失调。

书中叙述了怒引发的各种病证,如厥证、血证、飧泄、消渴、积证等。《素问·生气通天论》有“阳气者,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的记载。《素问·举痛论》曰:“怒则气逆,甚则呕血飧泄。”《灵枢·五变》曰:“怒则气上逆,胸中蓄积,血气逆留,髓皮充肌,血脉不行,转而为热,热则消肌肤,故为消瘴。”《灵枢·百病始生》曰:“卒然外中于寒,若内伤于忧怒,则气上逆,气上逆则六输不通,温气不行,凝血,……着而不去,而积成矣。”

《黄帝内经》还根据五行相克的规律提出了情志相胜治怒法。《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指出:“悲胜怒,……怒胜思……”;《素问·上古天真论》还主张“恬淡虚无”,“精神内守”的情志养生理论。

同为中医理论奠基之作的《难经》,其病因论说继承并发展了《黄帝内经》之说,认为病因有“正经自病”和“五邪所伤”的区别。《难经·四十九难》将“忧愁思虑则伤心”、“恚怒气逆,上而不下则伤肝”称为“正经自病”。其所谓“正经自病”以内伤为主,对宋代陈无择的“七情……为内所因”的论述无疑产生了一定影响。

东汉张仲景所著之《伤寒杂病论》开创了情志医学辨证论治的先河,其中《金匱要略》中对诸多杂病如百合病、梅核气、脏躁、奔豚气等与情志因素密切相关的疾病都确立了完整的理、法、方、药辨证论治原则。

三国时期的华佗在情志病的治疗方面颇有建树。据《后汉书·方术列传》记载,华佗曾治一太守久病,使之“盛怒”,“吐黑血数升而愈”,是现存较著名、较完整的情志治疗医案。

2 西晋至隋唐时期:怒志理论的纵深发展阶段

西晋至隋唐时期,情志致病理论有向纵深发展的趋势。主要是对《黄帝内经》的情志致病思想进行整理、注释与阐发。

西晋皇甫谧编纂的《针灸甲乙经》开宗明义强调神在针刺治疗中的重要意义。《针灸甲乙经·针灸禁忌》指出:“大怒无刺,已刺勿怒,……大惊大怒,必定其气乃刺之。”将怒列为针刺禁忌。认为大怒可引起气机逆乱,不宜针刺,针刺过程中,也应使情志安定,以免发生不良后果。

隋代巢元方撰写的《诸病源候论》全书50卷中,记载证候1739个,其中涉及情志的证候达106个^[1]。《诸病源候论·七气候》中将病因概括为七

气,“七气者,寒气、热气、怒气、悲气、忧气、喜气、愁气”;“怒气则上气不可忍,热痛上抢心,短气欲死,不得气息也;悲气则积聚在心下,不可饮食……”。在《诸病源候论·气诸病》中对怒为病因所致病证有详尽论述,如“夫逆气者,因怒则气逆,甚则呕血,及食而气逆上”。书中虽无具体治法,但附有养生、导引之法。

唐代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肾脏·补肾第八》中指出:“凡远思强虑伤人”,“忿怒不解伤人”,反复论证了各种精神刺激对人体的不良影响,并强调巢元方所言之“七气”为病,“皆生积聚”。《备急千金要方·肺脏·积气第五》指出情志因素可诱发积聚癌肿,颇有实际意义。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肝脏·肝脏脉论第一》中对《素问·调经论》中所述的“血有余则怒,不足则恐”的论述进行了阐发,提出“肝实则怒”的观点,并运用了防风散、地黄煎等方剂治疗。此外,孙思邈极重情志养生,《备急千金要方·养性·养性序第一》曰:“养生有五难,名利不去,为一难;喜怒不除,为二难……”,认为“多喜则忘错昏乱,多怒则百脉不定”。可见孙思邈强调“养性”乃养生之要旨的观点。

3 宋金元时期:怒志理论的成熟定型阶段

宋代陈无择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五科凡例》中指出:“七情者,喜怒忧思悲恐惊是,……七情人之常性,动之则先自脏腑郁发,外形于肢体,为内所因”,在《黄帝内经》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七情是三大类致病因素之一的著名论断。

金元四大家都将《黄帝内经》的情志学思想融会贯通,形成了各自鲜明的学术观点。刘完素提出“五志过极皆为热甚”的著名理论。《素问玄机原病式·六气为病》曰:“五脏之志者,怒、喜、思、悲、恐也,……若志过度则劳,劳则伤本脏。凡五志所伤皆热也。”他在论述癫狂证治时,重视情志因素,犹重怒气,认为“多喜为癫,多怒为狂。……怒为肝志,火实制金,不能平木,故肝实则多怒,而为狂也。况五志所发皆为热,故狂者五志间发,但多怒尔……”。在治疗狂证上,善用清热泻火,至今仍有指导意义^[2]。

李东垣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观点。他在《脾胃论·阴病治阳阳病治阴》中指出:脾胃内伤“先由喜怒忧思,为五贼所伤,而后胃气不行,劳役饮食不节继之,则元气乃伤”。认为情志因素是造成脾胃内伤的重要因素,而内伤热中证的热象,由“阴火”内燔所致。《脾胃论·脾胃虚实传变论》中写道:

“……喜怒忧恐,损耗元气,资助心火,火与元气不两立……”。《脾胃论·安养心神调治脾胃论》曰:“凡怒、忿、悲、思、恐、惧,皆损元气。夫阴火之炽盛,由心生凝滞,七情不安故也”,强调情志所伤与阴火的产生密切相关。张从正集金元时期情志病因学之大成,对《黄帝内经》中的怒致病理论进行了系统整理。《儒门事亲·九气感疾更相为治衍》中写道:“怒气所至,为呕血,为飧泄,为煎厥,为薄厥,为阳厥,为胸满胁痛。食则气逆而不下,为咳喘烦心,为消瘴,为肥气,为目暴盲,耳暴闭,筋解,发于外为疽痛”,总结了怒气所致的10余种疾病,认为其病机特点以气上为主。在《黄帝内经》情志相胜理论的启示下,张从正发挥道:“故悲可以制怒,以恻怛苦楚之言感之;……怒可以胜思,以侮辱欺罔之言触之……”,并留下大量情志病案,将《黄帝内经》“以情胜情”的疗法进行了实用化的发展和完善。

朱丹溪提出了著名的“阳有余阴不足论”及“相火论”,认为情志过激也是引动相火妄动的原因。《格致余论·疝气论》曰:“房劳则火起于肾,大怒则火起于肝”,并称“相火元气之贼”,认为相火能损耗阴精、元气,对人体危害甚大,在治疗上主张滋阴降火。《丹溪心法·小儿》中指出:“小儿易怒,肝病最多,大人亦然,肝只是有余,肾只是不足。”认为肝病多实证,也是引发怒的主要因素。

4 明清时期:怒志理论的全面实践阶段

至明清时期,情志学说日趋完善,陈无择所倡的七情学说开始受到普遍重视,这一时期有影响的医学文献中均包含大量的情志学说内容。

明代医家张景岳对情志的认识尤为全面,强调怒的生理、病理双重性^[3]。《景岳全书·理集·虚损》曰:“随怒随消者,未必致病,脏气坚固者,未必致病。”《类经·藏象类》指出:“怒出于肝,过则伤肝”,认为怒只有在超过个体承受的限度时才会致病。此外,张景岳提出了“五志互病”之说^[4]。《类经·疾病类》曰:“怒本属肝,而有曰胆为怒者,因肝胆相为表里,肝气虽强而取决于胆也。……心烦惋善怒者,以阳为阴胜,故病及于心也。……肾盛怒不止则伤志。”《景岳全书·理集·虚损》还指出:“易生嗔怒,水亏木燥,肝失所资也。”故云肝、胆、心、肾四脏皆能病怒,但他同时强调心的主导作用。对于怒之为病的治疗,张景岳认为,不同的阶段虚实不同,不可胶执一法^[4]。王肯堂的《证治准绳》记载了50多种情志所致病证,且专列神志门,专论情志病证,神志门

中还列有“怒”篇。在《证治准绳·杂病》中,认为中风与七情密切相关,“中气因七情内伤,气逆为病”,且“因怒而中者犹多”。江瓘集成《名医类案》中总医案数2384例,其中七情致病者共196例,占8.2%。七情发病以怒气为多,占50.5%,其次是忧、思。七情发病中,男女的相对比例分别为5.5%和15.2%,妇女多发,又以怒、忧二气致病为多^[5]。龚廷贤在《鲁府禁方·人有百病》中,将“喜怒偏执”列为第一病,重视情志致病,更重养生。在《万病回春·云林暇笔》中提出“怒则火起,难以获救”。可谓家庭自我保健之提纲。

及至清代,情志学说已广为人知,得到更为普遍的应用。王旭高在《西溪书屋夜话录》中对情志致肝病颇多论述。他提出“肝气、肝风、肝火三者同出异名”,认为情志太过如大怒可导致肝的疏泄太过而形成肝气过旺,进一步可引动肝风、肝火,创肝病三纲论治,立治肝30法,为肝病的治疗拓展了思路^[6]。

沈金鳌在《杂病源流犀烛》中写道:“怒者,肝胆病也。怒本情之正,惟发不中节,则肝胆之气横逆,而二经遂伤,且木盛克土,久必伤脾,怒所以为病也。”强调了怒属正常情志,太过才会致病,并认为“治怒为难,惟平肝可以治怒”,为医家治怒之法。林佩琴在《类证制裁·肝气》中记载了不少治怒验方与验案,对“因怒动肝”、“怒伤胁痛”、“怒动肝阳”、“肝阳化风”都提出了不同的治法方药,如疏肝理气、柔肝止痛、滋补肝阴、熄风镇阳之法。傅青主十分强调孕期的精神调摄,认为孕妇多怒、忧郁、惊恐均不利于胎儿正常发育。《傅青主女科·女科下卷》指出:“肝本藏血,肝怒则不藏,不藏则血难固。”阴血不足,胎失所养,则胎元难固。治疗时寓泻火于补气血之中,柔肝与养阴血相合,则“血不燥而气得和,怒气息而火自平”,胎元自固^[7]。《傅青主女科·产后编上卷》对于产后的郁怒气逆,则主张“必以补气血为先,佐以调肝顺气,则郁怒散而元气不损”。

叶天士在其代表作《临证指南医案》中记载了众多情志医案,他重视情志病因,认为七情过极,五志化火,可扰动身之阳气而致风从内生,尤其对怒、忧为病很有研究。叶天士认为,怒有嗔怒、郁怒、劳怒(怒劳)之分,如《临证指南医案·肝风》指出:“惊恐恼怒动肝,内风阳气沸腾”;“嗔怒动阳,劳怒伤气动肝”,且重视个性、体质以及季节因素对情志疾病的影响。书中与情志相关的病证达30个,与怒直接相关的有中风、眩晕、吐血、崩漏等,治疗往往以肝及气

为纲^[8]。晚清医家提出“怒则气逆伤脑”的病机。其中怒为病因,而肝气亢逆起中介作用,脑为靶器官,从而引起卒暴、中风、昏厥等病变,出现脑病症状^[9]。

总的说来,清代对怒志致病认识内容丰富,涉及病证繁多。在理论方面主要承袭了前人的认识,没有更多的突破和创新,但在实践方面的指导意义却得到了彰显。

5 近现代:怒志理论的客观化研究阶段

及至近现代,对怒的研究已逐渐进入客观化研究阶段,如“怒伤肝”动物模型研究,主要有夹尾法^[10]、夹尾应激配合肾上腺素注射法^[11]、束缚四肢悬吊法^[12]、光电刺激法^[13]、孤独饲养、模型侵入^[14]等法。怒致病机理的实验研究也已取得一定进展,研究表明,怒致病与心理应激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15],怒致病的病理机制主要通过神经—内分泌—免疫调节(NIM)网络系统的失调而最终导致躯体障碍^[16]。肝的疏泄功能也存在着一定的NIM网络调节机制,其中枢神经生物学机制在整体上与调节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有关^[17]。

6 小结

纵观整个怒志理论的发展历程,随着《黄帝内经》的问世而初步确立,经历了晋至隋唐的纵深发展,宋金元医家的融会贯通,明清医家的深入实践,经过历代医家的不断整理与阐发,从理论到实践,从病因、病证、药物治疗到情志疗法,内容涵盖广泛,而中国传统的心身一元论的思想贯穿始终。“怒伤肝”、“怒则气上”是怒致病机制的简要概括,“从肝论治”是医治怒病的主要法则。在心理学本土化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对传统古籍的整理和分析对于怒理论的研究,依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应进一步深入挖掘,以期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

参考文献

- [1]王米渠.中国古代医学心理学[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193.
- [2]潘玲,曾倩,陈聪,等.论刘完素对情志病病机的新认识[J].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2006,15(10):1276.
- [3]李宇涛,仲卫红.张景岳对情志双重性的认识[J].江西中医药,2005,36(7):11-12.
- [4]王玉华,李宇涛,仲卫红.张景岳脏腑情志相关理论浅探[J].中医杂志,2004,45(9):646.
- [5]王米渠,邹义壮,曾倩,等.《名医类案》196例七情发病构成及男女特点分析[J].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2006,15(8):983-984.
- [6]易法银,胡方林.王旭高肝病论治特色[J].上海中医药杂志,2003,37(2):42-43.

- [7]朱玲.傅青主安胎学术思想探微[J].中医药学刊,2002,20(4):458.
- [8]张慧.《临证指南医案》论治情志相关病证的学术思想探析[J].北京中医,2007,26(11):722-723.
- [9]金栋.“怒则气逆伤脑”病机探讨[J].甘肃中医,2010,23(2):9-10.
- [10]须惠仁,傅湘琦,向丽华,等.肝郁证的动物实验研究[J].中医杂志,1991,32(6):44.
- [11]陈松,李家邦,朱双罗,等.肝郁证T、B淋巴细胞活性改变及疏肝治疗影响的研究[J].湖南中医学院学报,2001,21(2):7.
- [12]樊蔚虹,岳广欣,李素香,等.长期激怒致肝肾阴虚证动物模型研制[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1,7(9):67-69.
- [13]于新凯,时文珠,左群,等.运动对心理应激大鼠行为及血浆皮质酮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的影响[J].中国运动医学杂志,2006,25(1):41-45.
- [14]刘晓伟,张红梅,曲宏达,等.“怒伤气”大鼠行为观察与检测[J].江苏中医药,2005,26(3):53-55.
- [15]严灿.从现代心理应激理论研究中肝主疏泄功能[J].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2000,17(3):209-211,274.
- [16]陶海燕,乔明琦,王文燕.怒致病与心理应激的相关性[J].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09,33(1):140.
- [17]严灿,徐志伟.肝主疏泄调畅情志功能的中枢神经生物学机制探讨[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05,25(5):459-462.

(收稿日期:2012-12-05;修回日期:2013-03-07)

[编辑:黄健]

第三届“白云山奇星·华佗再造丸”杯优秀论文征集通知

为进一步提示脑中风的发病机制,提高对这一疾病的认识,探索治疗新方法,获取国际上的最新研究进展。由中华中医药学会主办、《中医杂志》、《中国中药杂志》协办,广州白云山奇星药业有限公司、数源汇通(北京)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承办,共同发起第三届全国脑卒中诊疗实践学术研讨会暨第三届“白云山奇星·华佗再造丸”杯脑卒中诊疗实践优秀医学论文征集活动,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征文内容:出血性中风和缺血性中风的病理机制的研究进展;探讨脑的耐受和保护机制;中风内外科治疗的实验和临床进展探讨;中风病辨证论治规律、病因病机、治则治法、证候标准规范、方案优化、临床疗效评价方法、疗效机理以及新药研发等相关研究成果。

二、征文要求:1. 凡未公开发表的论著、述评、病例报告、讲座综述、实验研究、临床研究、经验总结等,均可投稿。按照杂志论文格式,要求800字中文摘要1份,包括目的、方法、结果、结论四部分,数据准确、重点突出、文字精炼。请在征文后详细注明姓名、工作单位、科室、邮政编码和电话、征文。截稿日期:2013年10月30日。请自留底稿,恕不退稿。论文投稿方式:邮寄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11号海通时代商务中心A1栋,数源汇通(北京)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收,邮编:100089,电话:010-68718711;或电子版发至:cnyxyx@cnyxyx.com。

三、联系方式:数源汇通(北京)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联系人:赵森,电话:010-68412716 转 603,传真:010-68715756,Email:cnyxyx-yx@cnyxyx.com